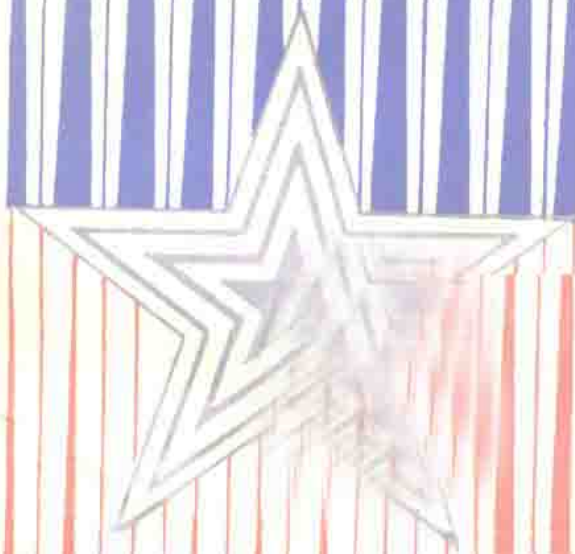


二难的旅程

——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美国政治生活史



多 难 的 旅 程

——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美国政治生活史

〔美〕弗雷德里克·西格尔 著

刘绪贻 吴驯叔 尹 宣 等译

朱鸿恩 刘绪贻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0 年·北京

TROUBLED JOURNEY
From Pearl Harbor to Ronald Reagan
Frederick F. Siegel
Hill and Wang New York 1984
根据希尔与王出版公司 1984年版本译出

DUǒNÀN DE LǚCHÉNG
多 难 的 旅 程
——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美国政治生活史
〔美〕弗雷德里克·西格尔 著
刘绪贻 吴驯叔 尹 宣 等译
朱鸿恩 刘绪贻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艺苑印刷厂印装
ISBN 7-100-00783-6/D·56

1990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23 千
印数 0—2,600册 印张 9 3/8

定价: 3.40 元

译者序

诚如作者自己所说,《多难的旅程》这本书是通过国际和美国政治的棱镜观察 1941 至 80 年代初美国社会文化生活的。作者认为,政治是理解美国生活的基本构架。因为,美国人来自世界各地,没有共同的血统和共同的故乡,把全体美国人民凝结成为一个整体的,乃是体现在《独立宣言》中的政治信念;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是和它的政治原则和理想分不开的。这种理想,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未受官僚主义污染的、由自治的个人组成的大体无政府的社会”,是“上帝的选国,是一块没有沾染旧世界罪恶的圣土,是一座照耀所有国家的正义灯塔。”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实行“新政”和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为了实现一种新的国家目标,即通过国家干预,扩大国内的经济、政治民主,并通过自由贸易、取消旧殖民制度等办法,将美国式民主传播到全世界。这就粉碎了上述传统的美国梦想。因此,内战后七十年来大部分时间治理着美国、珍视上述梦想,并自视为美国世袭统治者的新教共和党人,就对罗斯福、新政派及其内外政策怀有强烈的敌意,并不断伺机反攻。作者认为,珍珠港事变以后四十年间的美国政治生活,基本上可概括为“新政”继承者和反对者在各个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制约下组成的各种不同联盟之间的不断斗争;这种斗争的主要内容,则是美国政府在实现其职能的过程中,应当遵循何种原则:在国内,是自由放任呢?还是对社会经济生活实行广泛的干预和调节?在国际上,是实行孤立主义呢?还是积极介入世界事务?是重视亚洲甚于欧洲呢?还是重视欧洲甚于亚洲?是对苏联强硬呢?还是与苏联缓

和？

根据上述发展的总轮廓，作者对四十年来各个不同阶段“新政”继承者和反对者各种不同联盟的斗争，进行了简洁但比较全面的分析。他不独根据美国和国际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的演变论述了形成各个阶段斗争的形势，斗争的主要内容和过程，斗争双方联盟组成的阶级和思想基础以及各联盟内部的派系斗争，还从国际政治角度阐述了有关国家（特别是苏联）、从国内政治角度阐述了美国三权分立体制、两党政治等对这些斗争的作用。通过作者对这些斗争的分析，人们可以看到：从1941到1960年，以共和党为主的、反对受工人、少数民族、移民等欢迎的“新政”的联盟，是怎样在麦卡锡主义的推波助澜下，阻遏“新政”的发展、使杜鲁门的“公平施政”成绩有限、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实行所谓“有生气的保守主义”或“稳健的进步主义”，是怎样迫使美国政府摧残工人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并把美、苏、英战时大同盟变为美苏冷战的；从1961到1968年，以民主党为主的继承“新政”的联盟，是怎样在民权运动和新政治派的冲击下，打着“新边疆”和“伟大社会”旗号，把罗斯福开始的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改革发展发展到顶点的，是怎样陷入越战而作茧自缚的；从1969到80年代初，以共和党为主的反“新政”保守联盟，是怎样由于越战和60年代社会动乱的影响，由于从“新政”到“伟大社会”的副作用，日益壮大，使尼克松向“伟大社会”计划开刀并对苏实行缓和外交，使吉米·卡特民主党政府开始背离“新政”，并使极右派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的。最后，作者还分析了6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美国经济日益国际化，由于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美国社会日益向高薪阶层和低工资阶层两极分化，中等收入阶层大量减少，这意味着四十年来文化斗争行将终止。

由于《多难的旅程》公开声明是一本重写历史的书，它确有一

些新颖独到的见解。比如，它不同意沃尔特·拉费伯这样一些有影响的历史学家认为美苏冷战渊源甚早的意见，断定美苏冷战起始于1946年。因为杜鲁门总统在1945年4月继位之初，固然在驻苏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影响下，表示过要对苏强硬，但是，由于新政派的影响，杜鲁门在任职的前十个月，一直相信斯大林是个民族主义者，并不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行事，加之苏联人在战后要依赖美国友好援助医治战争创伤，所以美国有可能而且应该与苏联合作，并通过自由贸易、文化合作等逐渐影响苏联，使之成为一个西方文明国家。他也一直是按照这种政策思想与苏联打交道的。从1946年2月起，由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鹰派的煽动，美国人民怀疑苏联政策的日多。由于2月9日斯大林关于苏联被万恶的垄断资本家包围的演说，由于2月16日加拿大政府宣布逮捕刺探美国原子秘密的苏联间谍，由于3月6日邱吉尔的“铁幕”演说，特别是由于2月22日乔治·凯南的长电报，杜鲁门才改变思想，认为苏联政权的确是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行事的，苏联有一股政治势力，狂热地相信与美国不可能有持久的妥协。这样，才使杜鲁门政府最终走上了冷战的道路。

又比如，大多数美国历史书籍，都把50和60年代的美国显著分开，认为50年代是沉默的年代、循规蹈矩的年代，而60年代则是动乱的年代、离经叛道的年代。本书作者透过50年代表面的平静，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变化，看到“50年代美国生活的枢纽从生产转向消费，从体力劳动转向脑力劳动，从成年转向儿童，从旧日城市街坊转向新的城郊社区。”他还引用著名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话，说美国这个时期的社会，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拍卖场，一个庞大的文件夹，一个混合智囊，一种管理与操作的新系统。”在这种社会里，由于工人实际收入的较大增加，中产阶级日益扩大，在美国总人口中占多数。除最穷的人外，几乎所有白人城

市居民都可迁往郊区,形成“郊区民主化”和郊区“合成式的田园生活方式,即应用现代技术以重新创作杰斐逊式的拥有住宅的地产所有者的田园诗”。这种郊区中产阶级生活享受极为丰富,而且得意洋洋,感到前途似锦。

但是,就是那些吟成 50 年代田园诗的因素,正在悄悄破坏它。美国资本主义非凡扩张导致的高生产、高工资、高消费,破坏了节俭、勤劳、坚忍、对工作负责等传统美德,破坏了家庭生活,“也产生些奇怪的无聊价值和全国的不安”,并使少数(但在日益扩大)、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郊区居民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意志消沉”,“对生活的奇异厌恶。”他们感到“没有斗争格局给存在以定义,生活就似乎没有意义。”这就使他们追求新的目的和意义,有的人倾心于清静无为,皈依禅宗;大多数怀有不满情绪的人转向政治舞台,但由于所见所闻而感到失望。

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看不起这种暴发户式的中产阶级只讲消费不讲高尚情趣的生活方式,和艾森豪威尔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统治。他们从不同角度、但用几乎相同语言,抱怨美国生活的粗俗、肤浅、乡愿气和铜臭味,将之称为“消费至上的虚无主义”。保守派希望有一股精神改造的净化浪潮,将会洗掉现代世界的腐朽,除去“庞大公司和福利国家”这类现代污垢,回到那个消逝了的崇尚俭朴、私人道德和个人责任的世界;自由主义者希望乘这股现代化的浪潮,进入一种未来的时代,在那里,国家将用来重建生气勃勃的公共生活。约翰·加尔布雷思教授是当时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他的强调生活质量的见解,对美国迅速增长的学术与专业人口,具有巨大吸引力,为 60 年代的新阶级、新政治派和政治局面照亮了道路。

50 年代和 60 年代是紧密相联的。

又比如,对约翰逊“伟大社会”的评价,有肯定的,有否定的。应

该说,肯定的较多。但一般来说,这种肯定是比较审慎的。本书作者则认为:“‘伟大社会’在减轻贫困方面取得了戏剧性的效果。从1964到1968年,穷人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减少了一半,从百分之二十二降至百分之十一,一千七百万人摆脱了贫困。正如罗斯福的‘新政’把工人阶级、移民组织起来,将他们汇入美国生活的主流,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力图为黑人和穷人做同样的事。”

又比如,作者在分析1980年大选时,说里根把30年代以来精明的保守分子一直梦想着的将社会保守派(或小城镇保守派)和经济保守派(或街角保守派)联合起来的企图,变成了事实,是他取胜的重要原因。这也是较新颖的见解。

这样的例子很多,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不再列举了。不过应该提醒的是,在这本书中,读者还可以接触到许多体现战后美国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新鲜名词。例如:花花公子道德观、男性帝国主义、人口零增长运动、纳德搜查队、山峦俱乐部、自由主义的权势集团、新共和党多数、新黑暗时代、左翼麦卡锡分子、尼克松的休斯顿计划、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福利国家型的部落主义、新右派、右派平民主义、郊区王国派出的大使,爱与和平的年代、资本主义创造性的毁灭、菱形社会、职业上的两层分化,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当代美国,是非常有好处的。

本书作者弗雷德里克·F·西格尔生于1945年,是生育高峰期出世的一代。他获有匹茨堡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在纽约州立大学、昆斯学院、巴黎大学等讲授社会史、南部史、现代美国史与外交政策等课程,著有《旧南部中的新南部》一书,经常为《内战史》、《美国历史评论》、《异议》、《才智》、《公益》等杂志撰稿。本书出版时,他正从事现代美国自由主义的研究。他虽不是一位十分著名的史学家,但由于他是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受过60年代激进青年

运动的洗礼,熟悉当代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对新生事物十分敏感,比起老一代史学家如阿瑟·施莱辛格、约翰·富兰克林、威廉·洛克滕堡等人来,更能掌握战后时代美国政治生活和社会思潮的脉搏。加之这本书是他若干年来和朋友们多次讨论美国生活与政治的成果,所以议论纵横,思想活跃,涉及面广,语言生动,读起来很有兴趣,也很受人欢迎。著名史学家弗兰克·弗雷德尔说它“是就‘新政’以来美国生活中政府作用进行的文化论战所作的生动而新鲜的阐释”,“具有创见,发人深思”。当然,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非马克思主义学人,他虽然具有正义感,对美国当代政治、文化生活作出一些正确的论断,或可帮助我们深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精辟分析,但也有些论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希望读者注意鉴别。

本书的译者有:刘绪贻、吴驯叔、尹宣、刘末、蒋劲松、唐晓、何宏非、徐以骅、林洋、余胜祥、李洪山和黄建鑫;译文由朱鸿恩、刘绪贻校订。

刘 绪 贻

1988年5月4日于珞珈山

目 录

绪言	1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	4
第二章 关键性的 1946 年	21
第三章 孤立主义者的报复	51
第四章 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与繁荣时期的政治	91
第五章 从乌托邦到浊世	111
第六章 人造地球卫星的年代	123
第七章 新边疆派执政	137
第八章 从伟大社会到黑人权利	160
第九章 越南战争在美国内外	180
第十章 文化斗争	208
第十一章 尼克松与基辛格: 欺骗、美元、缓和	228
第十二章 1972 年总统选举和水门事件	256
第十三章 吉米·卡特、罗纳德·里根与乔治·华莱士 的遗产	274
后记 美国例外论的终结	284

绪 言

《多难的旅程》是公开承认将重新解释历史的著作。它通过国内外政治的棱镜，观察过去四十年来美国的社会与文化生活。从广义来看，政治是理解美国生活的基本构架。因为，由于缺乏共同血统与共同故乡所形成的神秘凝聚力，把整个美国联系在一起的，乃是《独立宣言》所体现的政治信念。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和它的政治原则是不可分离的。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写道：“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命定不能有许多意识形态，只能统一为一个整体。”或者如卡尔·弗里德里克所说：“作一个美国人是一种理想，而作一个法国人则是一种事实。”这种理想，是一种免于世俗与宗教官场习气的社会。汤姆·潘恩说：“社会自理属于政府的一切事务。”这种历史悠久的、没有受到官僚主义污染的、由自我管理的个人组成的大体无政府的社会的梦想，首先被“新政”，然后又由于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粉碎。在内战后7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治理着美国的新教共和党人，把自己看成是这个国家的世袭统治者。对他们说来，新政是亵渎神圣的政治。他们对罗斯福政策的反应，是强化丹尼斯·朗所谓的民主政治的节奏。这样，就产生一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循环，持续至今。

理解1941年以来美国政治的最好办法，是将之看成“罗斯福革命”的继承者和对手组成的各种联盟之间的不断斗争。由新政引起的冲突，象美国其他“重大”冲突——从杰克逊时代关于国民银行的斗争，到关于奴隶制、自由铸造银币与禁酒的斗争，以及关于干涉、遏制、福利、照顾措施、平等权利修正案与堕胎的斗争——

一样,如詹姆斯·Q. 威尔逊所指出的那样,乃是关于政府应当遵循何种原则的斗争。比如,1980年大选,可以看成是四十年来大体上就政府在美国生活中的作用所进行的政治—文化斗争的组成部分。用这种观点看,1980年里根的胜利,不过是新政损害共和党主义引起的报复与镇压的不断循环的最后一轮。如果尽量加以简单化,麦卡锡主义就是孤立主义者的“真正共和党主义”对罗斯福国内外政策的报复,而50年代的失败者及其子女,对以往折磨他们的人,在60年代得到了对他们制造浩劫的机会。在这四十年中,首先由于大规模消费、其次由于后工业主义引起的社会、经济变化,不断形成新的联盟,而这些联盟通过“相互冲突的刺激感情的标记的链条”,仍然和过去联系在一起。

和大多数写晚近美国史的著作不同,这本书从1941年写起。因为,不先弄清楚由于美国参加欧战造成的分歧和罗斯福外交政策抉择产生的困境,就不能理解麦卡锡主义与战后美国外交的轮廓。涉及1941至1954年间美国外交政策的三章,密切注意了舆论、政策制定者对苏联意图的看法、以及美国的盟国与敌国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沃尔特·拉费伯这样一些受人尊敬的修正主义者相反,我认为冷战的转折点出现于1946年,我对这一年中的—些重大而常被忽视的事态发展,进行了仔细考察。

第四至六章分析1945至1960年的国内生活。重点放在大规模生产、郊区化以及职业结构变化的发展和意义上。这些,预示着“60年代新阶级政治”的发展。第六章描述人造卫星引起的社会名流的恐惧,和为肯尼迪主义奠定基础的保守派与自由派对富裕的共同批评。

肯尼迪与约翰逊政府时期的越南战争与民权运动,是七至九章的中心内容。越南战争是和美国战后复兴欧洲的努力以及肯尼迪政府重新燃起战后对美国世纪的向往的专家治国论者的看法—

起讨论的。关于民权运动的论述，特别注意了美国激进派的必不可少的贡献，和黑人权力对“伟大社会”意想不到的后果。

第十至十三章叙述尼克松时代。首先讨论民权运动和一个受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员的“新阶级”，是如何改变政党结构的，如何在60和70年代引起一场新的、甚至比麦卡锡时期那场更紧张的文化内战的。十一、十二章分析美国外交政策中文化冲突的途径，和尼克松控制联邦官僚机构以击退“伟大社会”的失败企图。第十三章从这些早期事态发展一直写到“60年代的最后一次大选”——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的胜利。最后，后记中指出：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国际竞争引起美国经济的重新调整，这种调整又改变着美国的阶级与职业结构，随着这种趋势的演进，由新政肇始的往复的政治冲突，可能趋于消失。

(刘绪贻 译)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严峻考验

统治着大半个天下的人们鄙视美国观念，发誓要摧毁它……认为民主和自由受到威胁，并非歇斯底里。

——威廉·艾伦·怀特支持美国参加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发言

外交策略几乎不需要民主政治所独具的任何特征。反之，它们要求熟练地运用所有那些缺乏民主的特征。民主政治只有经过巨大困难，才能把一项重大任务的具体事宜管理得有条不紊，坚持固定计划，并无视严重障碍而予以执行。民主政治的实施既不能保密，也不能耐心地等待实施结果。

——阿列克西斯·托克维尔

抛开你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电影——许多出于消灭法西斯主义的决心而结成同志般友谊的大兵（通常是意大利人、爱尔兰人、犹太人，有时是黑人）形象——的回忆，军方战时调查表明：部队士气低落，几近崩溃。大多数士兵几乎不知道为何而战，也几乎无人关心战争的政治意义。他们呆在军队里是不得已；他们是为保全自己和伙伴们的生命而战，并非为保护某些高尚的原则。

国内的精神状态也好不了多少。公众对战争目的并不确知，对于支持全面对德战争犹豫不决。美国人对希特勒极其厌恶，但据陆军情报局调查，将近半数的公众对德国具有好感。在那些表态的人中，约有五分之一认为：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政策也许是有理的。过半数的人认为：犹太人在美国势力过大。虽然“新政”作家、

劳工领袖和知识分子们认为：对德作战是捍卫民主，而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美国人民并不认为德国有多少罪恶。他们最强烈情绪到后来对准日本时才爆发出来；因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的事件，要求对“卑鄙的日本佬”“以牙还牙”。只是由于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和随后我们了解到的大破坏，才大体上批准了参战。

在一般公众中，那些曾经强烈反对美国卷入战争的人，对战争最反感。批评罗斯福总统政策的孤立主义分子，称自己为“美国第一派。”他们深信：战争更可能将法西斯主义带进美国，而不是将民主制度带给世界其它地区。他们反战达到如此程度，以致“日本人袭击珍珠港虽然使美国参战，但没有使美国人民团结起来。”

批评罗斯福的共和党人，被日本人袭击弄得不知所措，暂时放弃了公开的孤立主义姿态。随着美国的参战，共和党人转而批评总统对战争的指导方式。象俄亥俄州国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这样一些共和党孤立主义者，叫嚷要对美国在珍珠港毫无准备的情况予以调查；许多人私下深信，珍珠港遭到偷袭，乃是罗斯福把国家推向战争的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于总统来说，1942年的国会选举是一次明显的失败。支持罗斯福政策的人们，曾希望在这次选举中，有115名孤立主义者将失败，但结果是：其中110名重新当选。整个选举结果是共和党在众议院增加44席，在参议院多获9席。一位作家在为共和党机关刊物《共和党人》写文章考评这次选举结果时说：“说孤立主义在这次选举中无足轻重将是可笑的。”政府在众议院仅剩七票微弱多数。象以前伍德罗·威尔逊总统那样，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面临孤立主义者造反的威胁。

在美国生活中，孤立主义是一种深远而持久的倾向。珍珠港事件虽迫使其暂时沉寂，但仍是一股强有力的暗流。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第一派”或某些自称“和平集团”的成员的人们，他们对

罗斯福的内外政策怀有强烈敌意。由于激烈反对共产主义，他们深信，魔鬼般机灵的罗斯福已计使美国陷入一场无谓的反对错误敌人的战争，就象他曾在国内运用诡计，把舶来的“新政”的“潜滋暗长的社会主义”措施强加给一个不善猜疑的民族。比起其他美国公民来，他们更容易相信我们能“和希特勒打交道”，他们把日本、特别是俄国视为美国的真正敌人。孤立主义者能全心全意顶住支持战争的压力，因为他们的异议是建立在历史悠久的美国不介入欧洲事务的传统之上的。他们感到自己是“真正的”美国人，误入歧途的是其他美国人。

孤立主义反映美国人中新教徒的观念：美国是上帝的选国，是一块未沾染旧世界罪恶的圣土，是一座照耀所有国家的正义灯塔。精神上植根于清教主义的孤立主义发展为行动时，采取的政治形式是乔治·华盛顿警告美国避开堕落的欧洲的告别辞。由于南、北两方与军事上虚弱的邻邦接壤，东、西两面有大洋为屏障，美国人具有一种自在安全和无懈可击的感觉。这种认识，使得年轻的阿布·林肯夸口道：“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所有军队，集世界上全部财富（我们自己的除外）于其军事金库之中，并由波拉帕特为统帅，经一千年的努力，也不可能靠武力饮上一口俄亥俄的河水，或在蓝岭上留下行踪。”但在孤立主义者常常引用的话中，也有林肯的警句：“危险”可能“发生在我们之中。”假如美国陷入危境，威胁将来自内部。

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激起广泛的反对，并加强了孤立主义。威尔逊力主战争，是因为他担心由一个国家（这里指帝国主义德国）统治欧洲大陆的后果。从美国利益来看，应使势力均衡得以维持。但是道学家威尔逊从未提到这样的想法；相反，他解释说，美国参战几乎完全是从德国的邪恶和美国的道义考虑问题的。这是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是捍卫民主的战争。威尔逊真诚地

相信：如果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被引向全世界，各国就将忙于创造财富，无暇去相互厮杀。然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并非取得对民主制度有利的胜利，却为如何处置德帝国的遗体而争吵不休。这似乎清楚地表明：美国人的大量鲜血白流了。

20 世纪 30 年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崛起，迫使美国再次注目大西洋彼岸。孤立主义者重提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提出了战争恶魔论。他们论证道：那些得到英国金融界出谋划策者支助的军火制造商、银行家和贪婪的国际资本家，把个人利益放在爱国主义之上，并阴险地将天真无邪的美国青年拖入欧洲的屠场。到 30 年代后期，群魔般的国际银行家和军火制造商被个别人物——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所取代，使他在美国成为最令人热爱又最遭憎恨的人。“20 世纪 30 年代产生大批负有特殊使命的人——其使命即警告美国：总统灵魂中具有叛逆之念。”他们会坚持认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是个将出卖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是个用亲吻毁灭美国的犹太。

出身高贵的罗斯福，在公司董事会会议室里遭到憎恨，被视为其所属阶层的叛徒。在美国的中心，在信仰新教的美国小市镇里也受到憎恨，因为在那些地方，他对工会、社会福利计划和政府管制的支持，被视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象征；这种社会力量正威胁着要摧毁人民自力更生和经济自我调节的 19 世纪式的世界。这个时期一首流行的本土主义小调唱道：

上帝保佑美国，
犹太人拥有它，
天主教徒管理它，
黑人喜爱它，
清教徒建立它，
但是，